

## \* 宋明儒學專輯 \*

# 田浩《儒家論說與朱熹地位之提升》 評介\*

劉述先\*\*

田浩的書雖然已經出版了好幾年，我一直到最近才得仔細讀這一部書，覺得很值得向讀者推介。這篇書評是寫得遲了一些，但總比不寫好。以下便是我的讀後感。

此書給我最深刻的一個印象是，當前美國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非常注重思想觀念出現與發展的脈絡，頗有一種強調脈絡化的趨勢。這與哲學家之注重思想觀念本身之內涵與深度十分不同，但同樣是一個很重要的不可輕易加以忽視的層面。中國傳統向來經史並重，既注重常，也注意變，兩方面交參互用，始能把握全貌。我一向浸潤於宋明理學思想觀念的內涵，此書則著力於其脈絡的展示，給與我很大的啟發。根據田浩的研究——他反對用英文「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一詞，以其泛而寡當，缺乏確定的意涵——，宋代道學的興起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道學的擁護者形成了一種「團契」(fellowship)，有非常複雜的關係網，所崇尚的價值與所繼承的傳統均與其他儒者不同，而有其特色。田浩的研究決不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指出儒家論說涉及三個層面(頁9)，即：(1)哲學玄思；(2)文化價值；(3)政治評論。而他把道學在南宋的發展畫分成為四個時期：

(1)第一期：一一二七至一一六二；

(2)第二期：一一六三至一一八一；

(3)第三期：一一八二至一二〇二；

---

\* Hoyt Cleveland Tillman,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寫完書評後才發現此書已有中文譯本：《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出版公司，1996年)。

\*\*本所研究員。

(4)第四期：一二〇二至一二七九。

田浩並未為這四個時期命名，但由他討論的人物與問題可見一斑。第一期可謂轉型期，討論張九成與胡宏。第二期可謂過度期，討論張栻、呂祖謙與朱熹。第三期可謂形成期，討論朱熹與陳亮、陸九淵。第四期可謂鞏固期，討論朱子門人與其他儒者。由這四個時期可以看到，朱子的地位不斷在提升中，最後才成為孔孟以後一人，被肯認為擔承道統、集大成的人物。田浩把朱子放進當時的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來考察，這成為他的書的一大特色。

第一期約當宋室南渡之際。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是張九成，他曾受學於楊龜山，他的學生曾編：《諸儒鴻道集》，凸出了他在當時的領導地位。但在朱熹著：〈雜學辨〉斥其不純雜以禪佛之說，這一條線索遂湮沒不彰。田浩重新將之發掘出來，乃是他的貢獻。這個時期另一重要人物是胡宏。我們都知道朱子曾經從張栻處探訪湖湘之學，一時為其聳動，但很快就對之不滿意，曾著〈知言疑義〉，對於五峰之說提出多項質疑，南軒後來既常隨朱子腳跟轉，其他門人也未能衛護師說，以至湖湘之學迅即沒落。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體與性體》才重新重視胡宏的思路，以之與劉宗周屬於同一型態，而在程朱、陸王之外，提出另有第三系的說法，引起許多爭議。田浩則指出湖湘的地理位置，也是其沒落的一個因素。

第二期道學最初的領袖人物是張栻，朱子雖比他大三歲，但卻是僻處閩南的一介窮儒，開始時虛心向南軒問學，後來位置才漸漸倒轉過來。南軒不幸早逝，其遺作經朱子刪削，已難窺全貌，作者依現有資料重新建構其思想，已屬難得，照田浩的意見，接替他的領導人物是呂祖謙。呂家身世顯赫，東萊人緣極佳，一早就任主考官，象山得中式，就是受到他的提拔。朱呂兩家並結為兒女親家。不幸東萊又因健康不佳而謝世，朱子才成為道學獨一無二的領袖人物。哈佛大學博爾（Peter K. Bol）教授在書評（JSYS 24, 1994）中曾對這一說法提出異議，他認為東萊沒有一整套哲學觀念，缺乏成為道家領袖的條件，田浩之說並未提出充分的證據加以支持。我覺得同道友好之間這種坦誠的討論是值得提倡的。而有趣的是，東萊雖在哲學方面缺乏創見，但在他與朱子合編《近思錄》時，卻堅持以「道體」篇為首，以之為一切學問的基礎，雖不必是學習的開始；也是在他的堅持之下，採入了伊川《易傳》的許多條目，而不論朱子對於該書的保留意見。

第三期才形成朱子成為一支獨秀的局面。張、呂既早逝，缺少了折衷的影響力，而朱子的危機感加深，傾向於嚴厲批評他認為不健康的思想與行為。於是先爆發他

與陳亮的爭辯，連帶攻擊浙東的功利思想，譴責東萊之駁雜不純所遺下的後患，其實功利派的葉適在政治上一向是支持道學的，卻也因哲學上的理由而被排除了出去。朱陸異同乃是大家熟悉的大題目，這是道學內部的爭辯。可以注意的一些情況是，陸氏家族事業可以自圓自足，根本不必仰賴朝廷。而象山反倒沒有像朱子那樣強烈厭惡科舉。朱子於象山本意存調停，但因曹立之墓表而彼此決裂。象山歿後，朱子因其門下之似禪宗之呵佛罵祖，規矩盡失，乃鳴鼓而攻。這樣的發展一方面造成朱子門庭之狹化，另一方面則令朱子成為道統獨一無二的擔承者，對於後世造成巨大的影響。

第四期通過朱子的門人與後學，鞏固了朱子所建立的道統。朱子逝世時，雖被誣為偽學，但很快就被平反，宋理宗時已完全恢復了道學的名譽。以後由於種種實際因素，宋末如史彌遠為相時，所用道學人數不斷上升。而真德秀的規模為後世帝王尊為楷模。到了元朝，朱子的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基礎，那就更不在話下了。據說朱子去世時，有「衣」傳給黃榦，但後儒畢竟不以禪宗的一脈單傳。只朱子地位不斷在提升中，終於從祀孔廟，成為孔、孟以後一人，其所以然其來有自，通過這一類脈絡化的研究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認為這本書應與三年以後出版的魏偉森的著作：《道的系譜：中華帝國後期儒家傳統的建構與應用》(Thomas Wilson, *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1995) 一齊讀，始能由脈絡化的觀點，對於儒學由北宋到明清之際的發展，得到一個更完整的圖象。魏偉森指出，《近思錄》的編纂開創了一個新的典範。它由學術的觀點選入了一些人物與著作，建構了一個傳統，自然而然也就把其他人物排除在這一個傳統以外。這一直到黃宗羲編《明儒學案》，全祖望根據他的構想編成《宋元學案》，情況都是如此。道學在這種方式之下形成了宗派，有向心和排他的雙重作用，我們看宋明理學，對於先秦儒學來說，的確開創了新的觀念與領域。通過一種自覺的努力使之與一般儒學畫分開來，所謂繼承孔孟不傳之祕，的確發生了作用而團聚了一批人，包括觀念與實際兩方面的結合，同時也把其他儒者排除在圈外，以至產生了向心與排他的雙重功能。這些是研究這個傳統的哲學內涵以外不可忽視的重要面向，也該受到我們適當的注意，故樂為之介。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